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期四篇讀者來函，或對本刊去年「反思改革二十年」一組文章各抒己見，或針對科技興國、宗教信仰問題有感而發，都顯示出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關切。也可以看出，國內不少讀者只能閱讀本刊網絡版。請各地讀者注意，從今年起，上海外文圖書公司可為各地機構和個人代辦本刊訂閱（請參閱第162頁廣告），希望各地讀者大力支持。《二十一世紀》印刷版的文章也因此將不會即時在網絡版貼出。

——編者

長遠政治穩定靠的是甚麼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康曉光〈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一文和12月號吳增定的商榷文章〈行政的歸行政，政治的歸政治〉，都對中國何以獲得政治穩定提出了見解，我對此有些不同看法。

康先生所用的「行政吸納政治」概念背後是「權力支配一切」的邏輯，這就意味着行政權—警察權的支配性。也就是說，作為「政治」的民眾參與、公民意願表達是受到行政權—警察權限制的，亦即個體權利

並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賦予公民以有限權利，只是國家政權為實現政治穩定而採取的權宜之計。這樣，康文對「行政吸納政治」於政治穩定所起作用——在香港案例中所得到的經驗——的樂觀態度，就很值得討論了。畢竟，香港早已因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和地理特徵，擁有成熟的市場規則、法制和文官系統。所以，香港可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與法治——西方的遊戲規則可以對香港起到強大監控作用！但套用於中國大陸則為大謬。

吳文對康文的「行政吸納政治」概念提出質疑，認為這個概念實質包含着「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兩重含義：前者意味着國家與社會分離、脫節，國家權威被社會架空；後者則是國家權力通過為社會提供經濟實利而重構權威。在此，吳文似乎沒有理解國家權力與社會、公民權利之間的分立、互相制衡的關係，以為社會的獨立必會架空國家權威。正因為如此，吳文才沒有認識到：社會政治性的缺失，即公民權利非制度化落實、社會不能組織化地與國家權力對話，才是長期政治穩定的最大威脅！這也使他後來為

中國開出的以民主塑造「國家認同感」和「政治德性」的處方無所定位而流於無效。因為民主只有作為分離的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權利的溝通制度時才能有效！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由國家倡導、自上而下進行的，即市場在其本源上就有政治權力的烙印。何清漣就曾直言中國市場化就是「權力市場化」的過程，楊小凱也明言「政府官員和私有企業之間的保護人和被保護人的關係是私有經濟在中國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可以確認，以市場為核心的社會經濟領域尚沒有在中國大陸獲得自主地位。「行政吸納政治」只會強化市場、社會對國家權力的依附性，導致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從而加大政治動盪的潛流。

中國必須通過建構民主與憲政保障公民個人權利，才能取得長遠的政治穩定，維護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只有國家與社會出現分離，社會得以組織化後，公民才能有序地通過民主途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和公共政策制定，「國家認同感」與「政治德性」才可以落實於制度層面。

賴建華 廣州

2003.2.19

改革的停滯與出路

在《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上，蕭濱教授的〈改革的停滯與自由主義的兩種調子〉一文提出，目前中國的改

革實際上是處於停滯期，思想界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兩種調子能夠相互補充、彼此制約、良性配合，為中國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思想資源。

蕭文認為，說改革目前處於停滯更妥帖。「既然是停滯，那隨着變革力量的驅動，改革也可能再度進行。」而「在中國思想界放大自由主義的聲音，就是避免改革繼續停滯下去的一個重要途徑。」蕭文選擇了「自由主義」的出路，但什麼是自由主義？蕭文認為，自由主義是「在(憲)法(主)治之下，建立政府權力的內部制衡結構和確立政府權力的外部約束邊界」。「古典自由主義的基調是平等的自由權利及其憲政民主的制度保障。」「現代自由主義的要義是平等與公正及其相應的制度保障。」我認為，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這兩方面的互相補充有着現實意義。一方面，我國不必按照一種直線進化論進行變革；另一方面，經濟改革已帶來社會的經濟分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地位分化，有必要提供機會平等、建立社會保障體制。

然而，誠如文中所描繪的改革背景，繼續改革也面臨着困難。經濟改革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對繼續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並不一致，學術思想界的認識與改革實踐也存在着落差。但是，思想界對政治改革實踐的作用是否被思想界自身誇大了？

畢競悅 北京
2003.2.12

立法加大科研投入，捨此諾獎沒戲

拜讀了貴刊曹聰的〈中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2002年12月號)一文，感觸良深。尤其是看到上海科學家王育竹先生在鐳射冷卻捕捉原子領域，雖然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就已取得了領先國外同行五到十年的頂尖成就，但終因經費短缺、實驗設備簡陋等原因，直至1993年才最終完成有關實驗，導致論文發表比國外同行晚了十個月，與諾獎失之交臂，不禁為之扼腕。

與其他領域相比，我們在科研經費的投入相形見绌。按說，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持續穩定增長之後，應該可以投入較多資金到教育和研究開發中，可令筆者難以理解的是，我們迄今依然是世界上研發費用佔GDP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而投入到基礎研究的佔科研經費的比例就少得更加可憐！

不用說世界教育、科技的第一大國美國如何，現僅僅比較一下東鄰日本的情況。日本在二戰後實行「科技立國」戰略，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科研經費在GDP構成中的比例。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陷入結構性不景氣，但卻始終嚴格的貫徹和實施這條「鐵律」，維持日本經濟在激烈的競爭中技術上端的地位。去年，島津製作所為日本貢獻了一位年僅42歲就摘取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的化工工程師，成為日本不景氣時代的英雄。可以說，一家公司就能夠製造一個「上班族諾獎獲得者」，靠的正是這種雷打

不動的對研發巨大投入的政策。

所以，從立法上保障科研投入，並在操作層面上確保貫徹、實施，不但能多留住幾個人才，而且也有利於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否則的話，中國本土科學家摘取諾獎桂冠，終不過是一個美夢而已。

劉樺 北京
2003.2.13

文化內捲化和民間信仰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網絡版)再次登載了張小軍的〈理解中國鄉村內捲化的機制〉(原刊1998年2月號)，文章寫得甚好，不過也反映了作者對於中國目前民間信仰的了解略有不足。

文中以兩個農民基督徒為例，說明農村的「文化內捲化」，所述兩位農民基督徒認為「人的照片都是偶像」，以及她們明知是錯誤仍要賣畫像，都不符合基督教教義。作者對這些農民基督徒淡淡嘲諷一番了事。其實這兩個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偏差與她們在民間長期受到壓制，得不到正確的教導有關。這兩個基督徒沒有參加中國官辦的「三自教會」，她們是在中國最底層堅持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信仰者。五十年來，這些信仰者默默堅持信仰的獨立性與超越性，他們為此受迫害但從不為此而抗議，更沒有採用暴力。在政教分離的意義上，這些基督徒也可視為「新政治文化」建設的參與者。

江登興 北京
2002.12.3